

# 疑虑: 评析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思考

牛 军

“疑虑”作为一段时期以来形成的中国人思考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对于中国对美外交的影响,甚至对整个中国外交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刻的。

用疑虑来概括冷战后中国人从战略层次思考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最恰如其分的,不论是从思考的起点,思考的心理状态,还是目前思考所处的状态等哪一方面看,都是如此。这里所谓的“疑虑”,简单地讲就是怀疑美国的战略意图,对中美关系的状况感到把握不定,对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深感忧虑,尽管有时也会泛起一阵希望,对改善中美关系报有一种积极的预期。

—

中国人的疑虑最初产生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天安门事件与苏联集团的崩溃几乎同时发生。美国政府以人权问题为理由制裁中国和在国际上孤立中国,以及在历次有关中国最惠国地位的争论中,美国国内各方面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议论和攻击,在中国人中引发了这种疑问,即为什么在苏联集团崩溃前,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存在那么严重的人权问题可以置诸脑后,而在苏联东欧巨变后,却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大张挞伐?

从当时的情况看,他们的反感和疑问导致的是被侮辱和被抛弃感,而不是怀疑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战略意图。而且基于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独特理解,他们对“老朋友”布什总统(在中国经过与美国的错误政策坚决斗争后)最终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是抱有希望的。因此中国决策层对布什政府的一些行动(包括布什在1992年大选期间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5战斗机)的反应,比较而言是相当有节制的。实际情况是到1992年间,中美关系也的确出现了改善的趋势。

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前后的有关言行导致中国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克林顿在竞选期间的一些言行,以及他领导的政府从执政伊始便公开宣布,其对华政策就是支持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并在不久后便为中国的最惠国地位附加人权条件,使中国决策层几乎断定,美

---

王缉思先生认为,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行为方式的影响,故更关注领导人之间和国家之间可以称为什么样的关系。如称某人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本身就意味着对此人意图的信任。因为朋友之间会产生误解,但不会或不该是尔虞我诈、见利忘义的。

有关这一状况的描述可见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431页。

《克里斯托弗在提名听证会上阐述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政策》,1993年1月13日,见1993年1月22日《参考资料》第9页。

国的意图就是“西化”、“分化”中国。这种认定一经形成,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其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从那以后,中国决策层显然一直认为,有必要对美国的意图保持警惕,要警钟长鸣,挫败被认为确实存在的美国的此类政策,成为中国一些重要的内外政策的起因和动力。

1993年夏季发生的“银河”号事件和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反对中国举办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事件,导致了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直到海湾战争期间,部分中国人还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是一个主持正义和敢于负责任的国家。但现在在更多的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在世界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国家。

美国形象变化引起的深层疑问是,美国为什么对中国采取如此霸道的、与推行民主自由没有多大关系的行为?这种疑问在本世纪初就存在,因此引起的共鸣也是巨大的。它与对美国反感的情绪相结合,成为后来那种断定美国企图阻止中国成为强国的看法的主要根源。那种看法目前在中国公众心目中即使不是占主流的,也是相当普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中美关系方面不论作出何种积极的努力,在中国人看来都是为形势所迫或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总之决不会是出于良好的愿望。

1993年中国决策层与中国公众在对美政策上开始形成共识,其契合点即在于对美国的意图的怀疑。中国决策层认为,美国的政策至少部分地包含着颠覆中国政府的企图。中国公众则相信,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很可能是不怀好意的。上上下下的怀疑导致了此后中国人对美国的反感的增长。

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公众(包括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开始认同并响应一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号召。在那次大会上,中国决策层给霸权主义的重新定义决定了冷战后中国反霸斗争的特殊含义。按照中国决策层的解释,冷战后霸权主义的主要特征差不多就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一切言行,例如在政治制度和人权问题上“强加于人”和“双重标准”;在台湾问题上“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中“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在军控问题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等等。

上述状况构成了中国人自李登辉访美后思考中美关系的主要背景,后来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思考就是在这样充满“怀疑”的气氛中展开的。

## 二

1994年5月,克林顿政府宣布将无条件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中美关系一度出现了改善的势头。那以后中国人也重新燃起希望之火,以为中美关系近一年多的平稳发展会长期持续下去。然而好景不长,1995年夏季,由于克林顿政府允许台湾的李登辉访美,在中

---

近年来在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的有关重要决议中,均反映出了对美国的意图的认识和警惕。参见江泽民《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199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1996年10月10日。均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4页,318页。

关于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的分析可参阅金灿荣:《中国人的美国观》,《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9—10期。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刘华秋:《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十四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284页。

美两国间引起了一场大风波。疑虑成为中国人思考中美关系的基调,而且越来越深刻。

差不多是从这时起,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辩论。与此同时在中国,也就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展开了频繁的讨论,其实也就是辩论,只不过不像美国那样公开和激烈罢了。

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促使中国有关方面在采取对策前急于弄清楚:美国在李登辉访美问题上出尔反尔用心何在,以及克林顿政府到底推行的是何种对华政策?讨论是在包括军队有关部门在内的各单位的国际问题专家中展开的,他们的看法不仅影响着公众舆论,而且对决策层的影响也在加强。讨论中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判断,即美国对华政策(1)是接触;(2)是遏制;(3)是接触与遏制并用,或曰软硬两手。这里无意详述各种观点之异同,只是想指出,不论哪一种判断,无不是以美国对华政策居心不良为前提的。“接触”也好,“遏制”也好,“软硬兼施”也好,无非都是些手段,其目的或者是为了“搞垮中国”,或是为了“阻止中国强大”,或是为了将中国纳入“……轨道”,总之不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

持不同观点的人们表现出的另一个共性是,他们都认为中美关系难以把握。如果追随讨论的过程便可以发现,他们对中美关系进程的判断,往往直接受到当时中美关系的状况的影响。通常是中美关系的持续波动导致了他们判断的波动。往复多次便产生了某种危机感,即担心中美关系会因长期动荡不定而失控,因中美关系动荡不定而感到把握不安,因把握不定而产生危机感。如此循环,最终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深切忧虑”的心理状态,并认定不确定性至少也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特征之一。

国际问题研究圈子里逐步兴盛起来的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讨论,强化了对美国政策的疑虑。从战略层次上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与在理论层次上比较独立地思考中国的国家利益,几乎是同步开始的。特别有意义的是,研究界对中国国家利益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与中国决策层的以往看法趋同,而且客观上起着将决策层的一些看法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中国在现阶段的主要国家利益就是发展经济、保持政治稳定和维护国家的统一,这些也被称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或生存发展的“起码基础”。

将中国国家利益的上述认定与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观察,其结论既是严峻的,也是一目了然的。国际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难题都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美利益对立已经具有“战略对立的味道了”。极而言之者甚至认为,对中国来说,当前中美之间的矛盾比冷战时期美苏矛盾都要来得复杂和严重,因为“美苏之间的危机问题绝大多数是双方境外权势争斗和国际霸权竞争,至少不直接关乎独立生存、

---

杨洁勉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指出了国际问题专家对决策的影响在加强。见《后冷战时期中美相互关系决策的特点》,《国际问题论坛》,1997年第3期。

可参阅1995年以来在《美国研究》《战略与管理》《国际经济评论》《太平洋学报》等杂志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论著。

天绪:《浅析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王缉思:《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阎学通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时殷弘著《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国内背景》,《战略与管理》,1996年6期;王缉思著《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吴白乙著《21世纪前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发展目标》,打印稿;阎学通:《中国的安全》,《美国研究中心简报》,1997年第7期。

王缉思:《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徐勇:《中国人的海洋时代:太平洋与边缘海战略》,《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根本制度的保存,而中美之间近年所发生并仍将可能发生的危机问题都直间接关系中国此类的核心利益,……”

在中美关系涉及的经贸、人权、安全、武器扩散等领域里,有相当多的现象可以被用来证明上述看法,不过最典型的仍然是台湾问题。当中国人说美国在打“台湾牌”时,绝不仅仅是在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且是在揭露美国企图阻止中国强盛。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完成国家的最后统一,中国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被称为强国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完全统一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历史,也是在挑战中国的未来。

疑虑所产生的影响与反感、愤慨等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后者营造了情绪化的气氛,前者则是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独特的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它不会推动对美国行为的过激和非理性的反应,但却引导出一种强烈的防范意识和诸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世界向多极格局发展和在中国周边建立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等的政策。从处理对美关系的角度看,它们结合在一起,可以被称为是“预防性反遏制”(它当然不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全部内容),其目的在于削弱美国将来有可能用于“遏制”中国的能力,最终迫使美国彻底地和永远地打消“遏制中国”的念头。

“疑虑”作为这一时期中国人思考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虽不像反感、愤慨和敌视那样情绪化和容易被感觉到,但对美国对美政策的影响,甚至于对中国外交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刻的。这种疑虑的存在,使关于美国愿意看到一个安定、繁荣和强大的中国一类言词,听起来像卓别林的喜剧,既滑稽又酸涩,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当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如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时,不仅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美国甚至不肯对其态度做基本的调整。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的疑虑不是可以被轻易抹去的。中国人对美国的批评有时听起来十分严厉,其实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中国不打算也没有精力管别人的事,也希望美国不要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要在台湾、西藏一类问题上向中国的核心利益挑战;中国人的疑虑也就在于,他们不相信美国真的会那样做,即使是在它声称要与中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后。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